

荒谬:存在的幽深之处 ——王小波对生命存在之谜的思考路径

刘晓丽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 上海 200062)

摘要: 本文从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文本分析入手,探求他对生命存在之谜的思考路径。《黄金时代》是以逻辑的推理演示了逻辑在生存境遇里实存与虚拟相交织的荒谬性。作者王小波放逐了爱情神话与英雄神话,从真正的民间立场上,逼近生命的意义所在:人为什么活着? 该怎样活着? 在特定时空内王小波找到了生命与存在的独特意义。

关键词: 黄金时代;王小波;存在;荒谬

写作可以有許多动机:为政治;为文学;为市场;为个体。但,无论何种动机,无论多么合理,都应立足于探求生命存在之谜。虽然谜底不可能明晰,但作家以血以心的思考,却意味着一种神圣的天职和勇气。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已故作家王小波才获得了我们深深的敬意。

一

《小说的艺术》中,米兰·昆德拉称小说家为“存在的勘探者”,而把小说的使命确定为“通过想象中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深思”,“揭示存在的不为人知的一面”。在此,昆德拉所说的“存在”,直接引自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那么,何谓“存在”? 海德格尔却说:“‘存在’这个概念是不可定义的。”于是,我们只能略微推断:它是一个关涉人和世界的本质范畴。于是,王小波作为“猜谜者”,在中篇小说《黄金时代》里,将“存在”即人和世界的本质作为小说的勘探对象。

《黄金时代》是以倒叙的方式,追寻着一段充满了异端体验的岁月。虽然,在王小波看来,“太平年月比乱世要好。这两种时代的区别比新鲜空气和臭屎的区别还大。”(《极端体验》)但是,“乱世”中的特定境遇才能让小说中的人物成为“实验性的自我”(昆德拉语),进而,对于存在的某些基本方面,也是最根本性的问题提出困惑与质疑。《黄金时代》中,王二是对存在的荒谬性是否存在提出疑问。陈清扬是对生命的意义是否就是忍受荒谬的存在的摧残提出困惑。两个主人公各自代表对存在的一个基本困惑,同时,又构成对那个时代的极端的反抗与挑战。所以,王小波在小说中,借人物——王二、陈清扬之口,不无庄严地宣告:“不管怎么说,那是我的黄金时代。虽然我被人当成流氓。”“那也是我的黄金时代。虽然我被人称为破鞋,但是我清白无辜。”的确,这样的荒诞岁月不堪回首,但唯有这样的岁月体验才能唤醒被遗忘了的存在。而且,无论对于作者、小说中的人物或者我们每一个,那已成为过去了的岁月并

收稿日期:2003-04-18

作者简介:刘晓丽(1968-),女,辽宁铁岭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

没有过去，那现如今看来荒诞的存在并不荒诞。不是吗？我们告别了造神的荒诞，又进入了一个物质统治的怪圈。其实，如果人类不真正地反省自身，当末日悄然地来临的时候，谁又会发现呢？也正是在这一点，《黄金时代》寂静地诞生在一个哗众取宠的当下，有一份经久的意义。

二

概括说来，《黄金时代》是以逻辑的推理演示了逻辑在生存境遇里实存与虚拟相交织的荒谬性。众所周知，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置身于身心分离的悖论的世界。一方面，它是一个依凭虚拟的逻辑统治的现实界：人没有自己的名字，大家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没有道理可讲。如陈清扬，大家说她是破鞋，她就是破鞋，她讲不出道理。另一方面，在实存的心灵追问的精神界，越是逻辑的就越是虚假的，正如王二的内心独语：“越是无可怀疑的事越是值得怀疑。”也如陈清扬的思考：“大家都说存在的东西一定不存在，这是因为眼前的一切都是骗局。”这样，在此悖论中，一个漫长的永不停息的个体生命对抗逻辑世界的自救便成了生存下去的唯一道路。这样，在《黄金时代》里，便将王二与陈清扬的“为了伟大的友谊”而走到一起的过程书写为证明自身存在的唯一可能。

小说一开始，便打破了常规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相遇时或浪漫或现实的俗套，而充满着出人意料之外的荒谬的色彩。二人相识不是身体的吸引，不是语言的共鸣，也不是利益的一致，更不是上天的安排。陈清扬找王二证明她不是破鞋，要王二安慰她。王二可以从逻辑上证明她不是破鞋。“如果陈清扬是破鞋，即陈清扬偷汉，则起码有一个某人为其所偷。如今不能指出某人，所以陈清扬偷汉不能成立。”但是，他偏说，陈清扬就是破鞋，而且，这一点毋庸置疑。这使陈清扬非常失望，因为有一人承认她不是破鞋，和没人承认大不一样。然而，王二终于不能为她证明。不能证明的原因与其说是王二发现自己什么都不能证明外，不如说他宁愿陈清扬就是破鞋，正如他就是流氓一样。理由似乎也不难猜出：只有这样的指称，才能证明自身的存在，而且，是一个“想爱，想

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的生猛存在。可见，小说在一开始，就进入了存在的幽深之处：存在，早已不是那个自行敞开、充满澄明之境的存在，而是一个屈从于逻辑的存在物的存在。人，不是命定了接受这个受遮蔽的存在，而是在此之中以荒诞的反抗避免让生命消失于这样的存在之中。当然，这样的发现一经了然，人的命运也将经历磨难。于是，王二与陈清扬接受了出逃、批斗、被监禁、写检讨材料等体验。不过，应该指出的是，二人的携手并肩不是为了神圣的爱情，至少在王二这里和爱情无关。王二只是缘于对女性身体结构的好奇，陈清扬是缘于难以抵御的孤寂。二人的故事也没有以往小说里受难的理性意义，二人只是听从一种生命的本能，捍卫着生命与生俱来的权利。作者王小波正是用此策略：在那异端岁月中，在那生猛的生命历程里放逐了爱情神话与英雄神话。才从真正的民间立场上，逼近生命的意义所在：人为什么活着？该怎样活着？

在一篇杂文《人性的逆转》中，王小波曾直言不讳地赞同了洛克的生命哲学：人活着，是为了追求快乐，这是不言自明的。由此，他提出了一个矛盾：“人到底该从利害的角度来定义崇高，还是另有一种先验的东西，叫做崇高……我也不怕人说我民族虚无主义，反正我以为前一种想法更对。”这段自白可谓解读《黄金时代》的关键。表面看来，这部中篇整个地围绕着两位主人公的“伟大的友谊”而展开，但细读来，便会发现：“伟大的友谊”的根基即是二人以互补的形式追寻着活着的意义。王二从始至终实践着作者的民间生命哲学：过生日时，任身体裸露于天空之下，犹如裸露存在本身那么快乐。与陈清扬第一次做爱，是由于这样的心理，“我已经21岁了，男女间的事还没体验过，真是不甘心”。好多年后，依然以娱乐的形式与陈清扬重温“伟大的友谊”。陈清扬似乎相反，快乐始终远离她，没人能证明她不是破鞋，没人能成全她的梦想。甚至每回做爱都深受折磨，她不想爱别人，任何人都不爱。但是，一经她在一个瞬间明白了人活在世的命数，“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忍受摧残，一直到死”，也就下定决心，走上前来，接受摧残。她从另一条道路体验到活着的快乐。但这里我们也还应该看到，作为女性的陈清扬和男性王二的感觉是不同的，陈清

扬的行为无意识地 and 爱意纠缠在了一起。在章风山上,当王二吻她脚心时,一股辛辣的感觉还是钻到她心里来。在清平山上,她被架在王二的肩上时,王二照着她的屁股狠狠地打了两下,那一瞬她觉得“如春藤绕树,小鸟依人”。她再也不想理会别的事,而且“在那一瞬间把一切都遗忘”。多年以后,陈清扬和王二重温“伟大的友谊”时,王二吻她的嘴,她并不反对(以前是反感的),感觉“很不坏”。在此,我们也不无理由肯定,陈清扬不会和“军代表”有“伟大的友谊”,而王二和“勒都家姐”则有产生“伟大的友谊”的可能,只不过勒都家姐未必配合。如果小说的叙述人换成陈清扬,《黄金时代》会是怎样一番情形?但这篇小说是男性作家王小波写就的,我们还是回到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得到了作者思考的起点——“人,为什么活着?”——一个阶段性的回答。

然而,这个阶段性的回答只是作者、也是每个个体生命一相情愿的预想。置身于此的存在,实际上,不仅不能提供实现快乐的保障,而且还以无处不在的存在物将人的一个又一个希望消亡,直到有那么一天,当我们挖掘自己时,看到的只是晦暗、混乱、麻木的存在物,已遗忘了什么是值得为之奋斗的东西,当然,已失去了对快乐的需求。那时,一切都可有也可无,包括人自身这一与其它生物没有什么区别的存在物。所以,“人该怎么活”这一疑惑不可避免地需要回答。

小说中王二与陈清扬之间的“伟大的友谊”从一开始就不是停止于寻求生命本该享有的快乐,而是以这种民间的方式反抗存在的荒谬,和陈独秀在狱中当着看守的面和妻子做爱异曲同工,更确切地说,“伟大的友谊”证明之所以让他们快乐无比,是因为“伟大的友谊”证明了他们作为个体生命的存在。如果我们敢于正视我们的生存境遇,就会相信赫舍尔的话不无道理:我们很少把人当人看。王二与陈清扬生活的时代的“我们”如此,我们生活的时代的“我们”亦如此,这是人类世界必须有勇气正视的“我们”的悲剧。这样,我们才能确定王二与陈清扬的“伟大的友谊”的深远意义:在荒谬的存在里证明存在的荒谬,进而证明生命的实存。换言之,个体与他人、个体与自身的关系同时构成我们存在的荒谬与我们对存在的

反抗。在小说中,有一段这样的描写:陈清扬坐在椅子上,听着风声,回想起以往发生的事情,对一切产生了怀疑。她很难相信自己会莫名其妙地来到这极荒凉的地方,又无端地被人称做破鞋,然后就真的搞起了破鞋。这件事真令人难以置信。这段心理描写与其说显现了命运的荒诞,不如说,显现了存在的荒谬:我们的存在并不讲逻辑,亦或者说,它唯一遵循的逻辑就是荒谬。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会备受摧残。陈清扬在悟出这一奥妙前,所接受人世的摧残就是要摧残掉她的不合荒谬的信念:真的事要有理由。终于,她承认了一切“罪孽”,她承认了与王二的“伟大友谊”是因为她喜欢。谁也不这样写材料,但是,她偏这样写。“以前她承认过分开双腿,现在又加上,她做这些事是因为她喜欢。做过这事和喜欢这事大不一样。前者该当出斗争差,后者就该五马分尸千刀万剐。但是谁也没权力把我们五马分尸,所以只好把我们放了。”她终于在真实中达成了与荒谬妥协的巧合并获得了荒谬的谅解。原来,在我们的世界,真实就是一种荒谬,荒谬害怕的就是真实。与陈清扬不一样,王二一向甘愿以流氓、恶棍自居,他似乎不关心存在的荒谬,或者荒谬的存在,甚至对自己的存在不存在的事也不太关心,几乎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有时,王二也钻过牛角尖,向别人证明自己的存在。但,随后,又觉得用不着去证明自己的存在,因为他深谙一句北方方言: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不存在,别人就不惦记。但是,不去证明自身的存在,只是他不得不选择的一个策略,并带有民间的智慧:“喂这些猪原来要三个妇女,现在要我一个人干。我发现我不能顶三个妇女,尤其是腰疼时。这时候,我真想证明我不存在。”事实上,他的一切行动均是在证明自身的存在:他用对军代表的沉默证明自己的存在,他用写材料的形式证明自己的存在,尤其,他用自己对“小和尚”的骄傲以及与陈清扬的“伟大的友谊”证明自身的存在。

总之,在这个荒谬的存在中,这份“伟大的友谊”的伟大之处,就是一同反抗存在的荒谬。进而,一同保有了生命的本质:陈清扬始终清白无辜,王二依然坚信伟大的友谊。就这样王小波从毫无诗意的世界中找出诗意,从荒诞性世界中挖掘出合理性,他找到了生命与存在的独特意义。

三

至此，我们不无理由地把《黄金时代》称为荒谬的形式与真实的生命相结合的故事。的确，王小波作为小说的叙述者，调侃着历史、政治、爱情、性，借此将一切被意识形态笼罩的问题还原出来。同时，也隐藏了那代青年所告别了的一段“受挫的激情”。如小说里随处可见这样的话：“那里的人习惯于把一切不是破鞋的人说成破鞋，而对真的破鞋放任自流。”“我想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

质，放到合适的地方就大放光彩。我的本质是流氓土匪一类，现在做个市民，学校的教员，就很不像样。”然而，在这种貌似调侃的语调中，蕴藏着对于人类生存处境的根本性思考。在这种含而不露的冷叙述中，任深刻的激情将他对于个体生命的探询推动到深层。

说到底，王小波是严肃的、炽热的。倘无这种内在的严肃，调侃即是一种轻浮，冷叙述即是一种冷漠。前者可流为媚俗，后者可消解意义。在今天的文坛，那种借调侃来取悦公众，靠冷漠来掩饰丧失了灵魂与血性的制作还少吗？

Absurdity: the Depths of Existence ——Wang Xiaobo's Approach to the Riddle of Existence of Life

LIU Xiaol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Starting from an analysis of the written version of Wang Xiaobo's novel *The Golden Age*, this paper explores Wang's thoughts on the riddle of existence of human life. By means of logical inference, the book reveals the absurdity that real logic mingles with fictitious one in people's living circumstances. The writer takes a viewpoint from a real folk standpoint rather than love and hero myths, pressing on towards the significance and meaning of human life: Why does man live? How should man live? Wang Xiaobo finds out the unique significance of living and existing in a given time and space.

Key words: *The Golden Age*, Wang Xiaobo, existence, absurdity

(责任编辑:吴晓明)